

反舞弊与刑事风控业务前沿 2025 年第 5 期（总第 57 期）



# 反舞弊与刑事风控前沿

二〇二五年第五期（总第五十七期）

上海市律师协会反舞弊与刑事风控专业委员



# 反舞弊与刑事风控前沿

## 目录

### 一、新规速递

1.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
2.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0

### 二、经典案例

- 3.最高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 32
- 4.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依法惩治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56

上海律协  
反舞弊与刑事风控  
专业委员会编

主 任：虞思明  
副主任：顾 伟  
李天航  
罗根达  
编 辑：熊云凤

2025 年 5 月 26 日

# 一、新规速递



## “两高”发布

### 《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 年 5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吴兆祥、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李相波，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罗庆东，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许成磊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黑土地是地球上珍贵的土壤资源。我国东北黑土区是北半球仅有的三大块黑土区之一，面积达 109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生态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2022 年 8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下简称《黑土地保护法》），为黑土地保护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黑土地保护法》的相关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专门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加强黑土地资源保护，依法从严惩处盗挖、滥挖黑土等破坏黑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

2024 年 4 月《解释》正式立项，历经一年多时间最终完成起草工作。解释起草中，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组成联合调研组，赴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踏勘破坏黑土地犯罪现场，多次开展实地调研和座谈，全面掌握破坏黑土地犯罪活动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就《解释》征求了全国法院、检察院系统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形成广泛共识。充分研究论证。多次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意见建议，专门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为解释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研究分析并充分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对《解释》进行了反复修改，确保《解释》的合法性、规范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释》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6 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1 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14 届检察委员会第 51 次会议审议通过。

## 二、《解释》的起草原则

一是坚持严格依法。《解释》坚持严格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黑土地保护法》的规定进行解释，准确把握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认真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依法严格公正审理破坏黑土地犯罪案件。如《解释》对各类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行为，依据刑法有关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和污染环境罪的相关规定，对法律适用和裁判规则进行明确，区分破坏黑土地犯罪行为的不同类型正确定罪量刑。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解释》主要围绕调研发现的破坏黑土地犯

罪案件司法中的突出问题与实践难题，如罪名适用问题、定罪量刑标准问题、事实认定难问题等作了解释，为执法办案提供裁判依据。比如针对实践中对“掏洞深挖”式和“蚂蚁搬家”式盗挖、滥挖黑土行为如何定罪量刑问题，《解释》参照《黑土地保护法》以黑土的体积（立方米数）作为行政处罚标准的做法，明确可以将采挖黑土的体积（立方米）数量作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一种入罪标准，切实严密刑事法网。

三是坚持从严惩处。《解释》贯彻落实《黑土地保护法》对破坏黑土地、污染黑土地行为从重处罚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严厉打击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决心和鲜明司法导向。比如《解释》在以往司法解释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基础上，适当降低了入罪和升档量刑的标准。

###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 14 条。主要包括：

**一是规定了破坏黑土地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认定及入罪标准。**

《解释》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耕地用途，造成耕地毁坏”采用整体认定模式，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黑土地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入罪门槛。对于永久基本农田，非法占用并毁坏达到“三亩”或者非法采挖黑土达到“五百立方米”的，可以入罪；对于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黑土地，非法占用并毁坏达到“六亩”或者非法采挖黑土达到“一千立方米”的，可以入罪，加大对粮食安全的保护力度。

二是规定非法开采属于矿产资源的黑土行为的处理。《解释》对实践中非法开采属于矿产资源的黑土的行为,明确可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三是规定严重污染黑土地行为的处理。《解释》贯彻落实《黑土地保护法》对防治黑土地污染的要求,依据刑法规定明确,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在黑土地上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黑土地的行为,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

四是规定掩饰、隐瞒犯罪行为的处理。为打击非法买卖黑土的行为,《解释》依据刑法规定明确,对明知是盗挖、滥挖等犯罪取得的黑土,而予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妥当定罪量刑。

五是规定了专门性事实问题的处理。针对当前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对有关专门性事实问题认定的实践需求,《解释》规定了可以依据鉴定意见、认定意见、有关机构出具的报告并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此外,《解释》还规定了竞合适用规则、单位犯罪的处理、数量数额的累计计算、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认定、行刑衔接以及针对耕地之外的黑土实施破坏行为的处理等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6 次会议、2025 年 4 月 11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5 月 6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 年 4 月 30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5〕7 号**

（2025 年 3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6 次会议、2025 年 4 月 1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5 年 5 月 6 日起施行）

为依法保护黑土地，惩治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耕地用途，造成耕地毁坏：

（一）非法占用黑土地实施建房、建窑、建坟、挖湖造景等工程建设的；

（二）非法占用黑土地实施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活动的；

（三）非法占用黑土地排放污染物、堆放废弃物等造成黑土地被严重污染的；

(四) 其他非法占用黑土地, 改变被占用黑土地用途, 造成黑土地毁坏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一) 非法占用并毁坏属于永久基本农田的黑土地三亩以上, 或者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黑土地六亩以上的;

(二) 非法在属于永久基本农田的黑土地上取黑土五百立方米以上, 或者非法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黑土地上取黑土一千立方米以上的;

(三) 非法占用并毁坏黑土地, 或者非法在黑土地上取黑土, 数量虽未分别达到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 但按相应标准的比例折算合计达到标准的;

(四) 二年内曾因非法占用农用地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又非法占用并毁坏黑土地, 数量达到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第二条**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非法开采属于矿产资源的黑土, 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黑土地, 符合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 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 致使属于永久基本农田的黑土地六亩以上或者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黑土地十二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第一款行为，致使属于永久基本农田的黑土地三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应当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四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或者第三条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或者污染环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黑土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妥当定罪量刑。

实施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六条** 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在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等行政处理决定后继续实施相关行为的；

（二）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实施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行贿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七条** 组织他人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的，应当按照其组织实施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受雇佣为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曾因破坏土地资源受过刑事处罚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

**第八条** 单位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多次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多次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行为未经处理的，数量、数额累计计算。

**第十条** 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的行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动机目的、对黑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是否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第十一条** 对于实施破坏黑土地资源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宣告无罪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涉案黑土地类型、面积，涉案黑土体积、数量、价值等专门性事实问题，可以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行政、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或者价格认证机构、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指定或推荐的机构、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十三条** 本解释所称“黑土地”，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相关区域范围内具有黑色或者暗黑色腐殖质表土层，性状好、

肥力高的耕地。

盗挖、滥挖、非法买卖前款规定相关区域的林地、草原、湿地、河湖等范围内农用地的黑土，参照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 2025 年 5 月 6 日起施行。



## “两高”发布

###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 年 4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李剑、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刘太宗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调要完善相关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2013 年至 2024 年间，提起公诉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6.91 万件，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6.46 万件，对于服务品牌强国建设、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促推创新创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我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担当和作为。

当前，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易发多发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犯罪行为呈现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社会各界创新创业主体对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需求日益强烈。2021 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犯罪行为类型，完善了入罪标准，增设了新罪名。因此，亟需制定一部符合中央政策

和立法精神、满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需求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本《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要求。《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次全新的系统性解释，吸收、整合了此前三部相关司法解释的有效规定，同时废止了前三部司法解释，以便于司法实践操作，有效规范刑事案件办理，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为创新创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 二、《解释》的基本特点

《解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保护、依法解释、法治统一、问题导向，确保内容科学合理、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实践需要，具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坚持严格保护，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解释》关于入罪标准主要沿用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降低部分犯罪入罪门槛，从源头上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凸显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理念。同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设置从重、从轻处罚条文，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确保罪责刑一致。

**二是坚持依法解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遵循权利法定和罪刑法定“双重法定”原则。《解释》严格遵循刑法、知识产权部门法的明文规定和立法本意，结合司法实践，依法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罪状含义，厘清罪与非罪的边界，特别是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的界限。

三是坚持法治统一，确保司法标准一致。《解释》对刑法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复制发行”等法律用语的解释与著作权法的规定保持一致，确保刑事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部门法规定的一致性，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的协调性，确保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保护整体合力的发挥。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凝聚法治共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调研，全面系统梳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反复研究论证，对解释稿多次进行修改完善。《解释》对“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等实践中争议较大问题进一步明确标准，确保相关刑法规定得到切实有效实施。

###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 31 条，具体分为五部分：

一是商标犯罪相关规定。《解释》对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同一种商品、服务”“相同商标”“注册商标标识”等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在吸收整合原有司法解释基础上，增加规定了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等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

二是假冒专利罪相关规定。《解释》规定了“假冒他人专利”的具体情形以及假冒专利罪的入罪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了入罪门槛。

三是著作权犯罪相关规定。《解释》对争议较大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等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在整合原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规定了著作权犯罪的入罪标准。

四是商业秘密犯罪相关规定。《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盗窃”“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标准，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具体规则，明确了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等认定标准。

五是知识产权犯罪共性问题的规定。《解释》进一步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共同犯罪、从重从轻处罚、罚金适用、单位犯罪、没收和销毁等适用标准以及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等的具体认定规则。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配套发布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这些案件的办理体现了《解释》的精神，有助于对《解释》的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25 年 4 月 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7 次会议、2025 年 4 月 11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4 月 26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 年 4 月 23 日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法释〔2025〕5 号

(2025 年 4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47 次会议、2025 年 4 月 1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5 年 4 月 26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服务”：

(一) 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名称、实际提供的服务名称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名称相同的；

(二) 商品名称不同，但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商品的；

(三) 服务名称不同，但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场所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种服务的。



认定“同一种商品、服务”，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和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实际提供的服务之间进行比较。

**第二条** 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

**第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 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 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 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 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 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 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既假冒商品注册商标, 又假冒服务注册商标, 假冒商品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不足本条第一款规定标准, 但与假冒服务注册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合计达到本条第二款规定标准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三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四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

（三）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四）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的；

（五）被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发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转移、销毁侵权商品、会计凭证等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第五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 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 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 货值金额达到本款前两项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 或者已销售商品的销售金额不足本款前两项标准, 但与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本款前两项规定的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

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货值金额或者销售金额与货值金额合计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六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 标识数量在五千件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 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 标识数量在五千件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四）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的标识数量不足本款前三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标识数量合计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标识数量、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七条** 本解释所称“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是指识别商品、服务不同来源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虽然注册商标不同，但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均指向同一商品、服务来源的，不应当认定为“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本解释所称注册商标标识“件”，一般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对于在一件有形载体上印制数个标识图样，该标识图样不能脱离有形载体单独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一件标识。

**第八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



(一) 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二) 未经许可, 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

(三) 未经许可, 在合同、产品说明书或者广告等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 使人误认为是他人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

**第十条** 假冒他人专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 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 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 二年内因实施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一条** 实施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 没有取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授权, 或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 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

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且该作品、录音录像制品上存在着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在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信息网络传播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未经表演者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或者录音录像制品、表演者的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等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既复制又发行或者为发行而复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表演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五百份（张）以上的；

（四）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表演，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的，或者下载数量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或者被点击数量达到十万次以上的，或者以会员制方式传播，注册会员数量达到一千人以上的；

（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而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为他人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数量达到本条前两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销售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三）销售他人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复制件数量合计在一千份（张）以上的；

（四）侵权复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或者侵权复制品数量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或者已销售侵权复制品的销售金额、数量不足本款前三项标准，但与尚未销售的侵权复制品的货值金额、数量合计达到本款前三项规定标准三倍以上。

**第十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十六条** 采取非法复制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窃”；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电子侵入”。

**第十七条** 侵犯商业秘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 （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 （三）二年内因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造成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侵犯商业秘密，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或者数额达到本条前款相应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第十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损失数额”，按照下列方式予以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



损失确定, 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 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 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 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保密义务、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 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 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 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等因素综合确定。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 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 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 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 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 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九条** 本解释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是指因披露、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或者因使用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润。该利润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十条** 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具有本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二十一条**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案外人书面申请对有关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证据、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违反前款有关保密措施的要求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接触、获取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 （一）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的；
- （二）提供贷款、资金、账号、许可证件、支付结算等服务的；
- （三）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快递、邮寄等服务的；

(四)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

(五) 其他帮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般酌情从重处罚:

(一) 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 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或者服务注册商标的;

(三) 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第二十四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一) 认罪认罚的;

(二) 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三)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犯罪情节轻微的, 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以犯罪论处。

**第二十五条**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 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危害性等情节, 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无法查清的, 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

十以上一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罚金的，一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第二十六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注册商标标识或者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和销毁。

上述物品需要作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经权利人申请，可以在民事、行政案件终结后或者采取取样、拍照等方式对证据固定后予以销毁。

**第二十八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尚未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无法查清的，按照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或者侵权产品没有标价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本解释所称“货值金额”，依照前款规定的尚未销售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价值认定。

本解释所称“销售金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出售侵权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出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提供服务的，扣除该项服务中所使用产品的购进价款。通过收取服务费、会员费或者广告费等方式营利的，收取的费用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第二十九条** 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处理且依法应当追诉的，定罪量刑所涉数额、数量等分别累计计算。

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有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

**第三十一条** 本解释自 2025 年 4 月 26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 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7〕6

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20〕10 号）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12 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后，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 二、经典案例



## 最高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 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

#### 深化检汇行刑衔接

#### 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聚焦外汇领域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明确办案规则，依法打击涉外汇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

记者采访了解到，非法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而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的，则依法应追究行政责任。本次发布的李某乙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等 6 件案例中，检察机关联合外汇管理部门推动纵向、横向、跨区域一体履职，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尺度、示范程序衔接路径，防止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因“不刑不罚”而产生监管漏洞，从而形成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治理闭环，取得良好成效。

个人仅出借外汇账户但未直接参与非法经营活动，由于缺乏主观故意，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次发布的樊某、赵某某、罗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中，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非法买卖外汇案件中是否营利并非行政处罚的必要要件，樊某等三人从事营利性和未营利性的变相买卖外汇、非法介绍买卖外汇的违法行为，均应被行政处罚，并梳理、移送案件证据，后外汇管理部门依法对樊某等三人处以 140 万元至 286.7 万元不等的行



政罚款。同时，当地检察机关和外汇管理部门以办理该案为契机，共同出台关于惩治金融违法犯罪、防范金融风险协作机制的有关意见，充分发挥各方在金融监管、惩治违法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作用，消除追责盲区，确保打击无死角。

该批典型案例也警示社会公众，不要贪图一时之利，利用正常跨境经贸往来中积累的资金和客户资源等，协助从事非法买卖外汇活动或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应通过银行等正规渠道合法办理外汇业务，自觉抵制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最高检行政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等要求，在事前、事中、事后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外汇管理部门行政处罚工作顺利开展，完善外汇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确保精准打击涉外汇违法犯罪行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关于印发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

### 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局：

依法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有力有效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检察机关和外汇管理部门

的共同目标。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要求，深化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工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实现对涉外汇刑事犯罪、行政违法行为的精准打击，多维度织密国家金融安全“防护网”，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选编了 6 件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5 年 4 月 22 日

### **案例一 李某乙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

####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 非法买卖外汇 案件管辖 调查核实

#### **【基本案情】**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李某甲等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利用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从事中越跨国物流运输服务的便利，为招揽顾客从而谋取更多利益，非法为中国境内客户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并与越南人黄某（另案处理）非法进行外汇兑换。期间，李某甲安排李某乙等在中国境内负责收取中国客户人民币后转账给李某甲，再由李某甲使用其名下国内银行账户按照黄某

个人提供的汇率，向黄某掌握的中国境内银行卡进行转账，从而换取越南盾。李某甲为中国境内顾客收取涉案资金中垫付货款用于兑换越南盾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047 亿元。李某乙在李某甲的安排下，于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为李某甲非法从事资金结算服务以及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提供帮助，帮助在中国境内收取客户人民币 4171 万元、帮助兑换越南盾金额为 45.07 万元人民币。

2023 年 12 月 18 日，贵州省荔波县公安局以李某甲、李某乙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4 年 4 月 3 日，荔波县人民检察院对李某甲以非法经营罪依法提起公诉。因李某甲在外汇资金结算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预缴罚金、自愿认罪认罚，悔罪态度好等从轻、从宽情节，荔波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40 万元。

荔波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乙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从犯、坦白、认罪认罚、初犯等情节，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 **【行刑反向衔接情况】**

**审查核实。**因荔波县没有外汇管理部门，荔波县检察院将案件报请上一级检察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下简

称黔南州检察院) 审查。黔南州检察院经审查, 认为李某乙非法汇兑越南盾与人民币违法行为事实清楚,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因该案刑事案件管辖地与外汇违法行为地不一致, 黔南州检察院向贵州省检察院报告。

**会商研判。**为加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 防止“当罚不罚”, 2024 年 6 月 3 日, 贵州省检察院、黔南州检察院、荔波县检察院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黔南州分局围绕案件管辖、处罚范围、处罚标准等问题进行会商座谈, 并达成以下共识: 1. 因本案违法行为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因此需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依法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请示确定本案管辖后, 检察机关再制发检察意见。2. 综合考量李某乙实施的违法行为、情节等, 对其直接从事越南盾与人民币非法汇兑行为, 应予以行政处罚。

**检察意见。**结合会商意见, 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上报请示, 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本案由黔南州分局管辖。2024 年 6 月 19 日, 黔南州检察院向国家外汇管理局黔南州分局制发检察意见, 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等规定对李某乙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同时建议综合考量其违法事实、情节、作用和社会危害程度, 从惩治和教育的角度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确保过罚相当。

**处理结果。**国家外汇管理局黔南州分局采纳检察意见, 经立案和调查核实, 确认李某乙从事越南盾与人民币非法汇兑金额为



45.07 万元人民币。2024 年 7 月 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黔南州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外汇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鉴于李某乙积极主动配合行政检查，在一般情节量罚区间下限到中间值之间，依法对李某乙作出警告，处罚款 3.15 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处理结果回复黔南州检察院。李某乙接受行政处罚并缴纳了罚款。

### **【典型意义】**

行刑反向衔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及时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人民检察院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提出检察意见，向有关主管部门移送的是案件而不是线索。

刑事案件管辖地与外汇违法行为地不一致，且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所在地没有外汇管理部门，需要先行确定管辖外汇违法行为的外汇管理部门的，可以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与外汇管理部门就管辖问题进行协商。需要向上级外汇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的，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层报与该行政主管部门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提出。

## **案例二 郑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

###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 非法买卖外汇 跨境对敲 证据材料移交

### 【基本案情】

2015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郑某某在没有取得国家金融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在国家规定场所以外，在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等地区，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实施倒买倒卖外汇（币种为人民币与韩币），交易金额合计 551 万元人民币，非法获利 1 万余元人民币。案发后，郑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1 万元人民币。

2023 年 11 月 29 日，珲春市公安局以郑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珲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郑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投案自首、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 【行刑反向衔接情况】

**审查核实。**在审查起诉阶段，珲春市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同步对郑某某违法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进行审查。同时，将遇到的跨境对敲证据采信、法律适用以及资金追缴等难点问题层报延边州人民检察院，争取业务指导和支持。经审查认定，郑某某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行政

责任。珲春市人民检察院对郑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告知其可能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

**会商协作。**延边州人民检察院、珲春市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延边州分局围绕本案行政违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处罚必要性、后续反向衔接相关程序等进行会商座谈，明确移送案件材料除检察意见书、不起诉决定书外，一并移送违法行为人的讯问笔录、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以及其他有助于行政机关处罚决定的证据材料。关于公安机关侦查卷宗的移送，由检察机关协商公安机关直接移送（电子卷），或由检察机关剥离侦查卷宗内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证据后再移交。

**检察意见。**2024 年 2 月 19 日，延边州检察机关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延边州分局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郑某某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一并移送案卷相关证据材料。同时将被不起诉人的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书面告知外汇管理部门，确保行政处罚“无缝衔接”。

**处理结果。**国家外汇管理局延边州分局收到检察意见书后，立案并开展行政调查，查实郑某某的行政违法事实。2024 年 8 月 27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延边州分局向郑某某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郑某某认为自己存在从轻处罚情节提出听证申请。听证会上，外汇管理部门进行释法说理，消除违法行为人的抵触情绪。2024 年 9 月 30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外汇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鉴于郑某某积极主动配合行政检查，在一般情节量罚区间下限到中间值之间，对郑某某作出警告，处罚款 44.12 万元人民币。郑某某表示对处罚决定无异议，罚款已收缴到位。

**机制建设。**延边州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延边州分局召开联席会议，从管辖权确定、案件材料移送范围、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自机制建立以来，对 8 件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进行研讨会商，就证据采信、可处罚性以及处罚额度等问题进行沟通，检察意见均被采纳。

### 【典型意义】

依法打击非法买卖外汇是一项系统工程，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需要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全链条、多层次的深度协作。检察机关可以在决定不起诉的同时固定行政违法证据、告知违法行为人拟承担行政处罚，为后续外汇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做好保障。

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可以建立案件移送机制，确定除检察意见书、不起诉决定书外的证据移交范围，包括复制被不起诉人的讯问笔录、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情形、初犯偶犯等证据材料，也可以根据办案需要，协商公安机关复制移送相关证据材料，以检察机关的高质效办案与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慎审查，形成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合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 案例三 陈某红、吴某荣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

###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 非法出借外汇账户 帮助行为 处罚必要性

### 【基本案情】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陈某某在未实际从事进出口外贸生意的情况下,以其本人、丈夫吴某林及亲戚陈某红、吴某荣等人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在银行开具多个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后以虚构贸易的形式,将上述账户提供给地下钱庄团伙用于接收外汇,并在银行办理结汇后将人民币转入地下钱庄团伙指定的国内他人账户,涉案金额 5.6 亿元人民币,从中收取手续费及银行结汇给予的返点获利 76 万余元人民币。其间,吴某林多次按照陈某某的指示前往银行进行非法结汇,涉案金额 1.9 亿元人民币。陈某红、吴某荣明知陈某某为他人结算,仍应其要求,开设电子商务商行及具有结汇功能的银行结算账户供其使用,并分别结汇欧元折合人民币 0.85 亿余元、1.75 亿余元。

2024 年 2 月 29 日,浙江省文成县公安局以陈某某、吴某林、陈某红、吴某荣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于 2024 年 6 月 7 日、9 月 3 日对陈某某、吴某林提起公诉。鉴于二人系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等情节,文成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150 万元人民币,判处吴某林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 60 万元人民币。

文成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红、吴某荣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行为,但犯罪

情节轻微，均基于亲属关系将外汇账户出借给陈某某，未从中获利，且具有从犯、坦白、自愿认罪认罚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 **【行刑反向衔接情况】**

**审查核实。**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被不起诉人陈某红、吴某荣虽有提供外汇账户给陈某某，但不能证明其直接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其以非法买卖外汇予以行政处罚的依据不足。但个人外汇结算账户的使用应遵守外汇账户管理规定，不得出借、串用或者转让，陈某红、吴某荣的行为违反《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项对陈某红、吴某荣进行行政处罚。鉴于本案疑难复杂，同时本案行政处罚的主体系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文成县人民检察院遂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向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汇报请求同步指导。

**会商协作。**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文成县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围绕处罚依据及处罚必要性、后续反向衔接相关程序等进行多次座谈沟通，研究认为陈某红、吴某荣的行为违反了外汇账户管理规定，本案涉及外汇金额特别巨大，且文成县外汇市场交易活跃，本案应依法处罚。同时双方商定，检察机关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制发《检察意见书》后，由文成



县人民检察院协助，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异地调查取证、送达告知等提供便利。

**检察意见。**2024 年 11 月 7 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送达《检察意见书》，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项，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对陈某红、吴某荣予以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2025 年 1 月 24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外汇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鉴于陈某红、吴某荣积极主动配合行政检查，在一般情节量罚区间下限到中间值之间，对陈某红作出警告，处罚款 2 万元人民币；对吴某荣作出警告，处罚款 2.5 万元人民币，罚款已收缴到位。

**促进治理。**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文成县人民检察院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分局召开座谈会，研讨健全外汇交易风控体系、强化内部监管、加强政策宣传等问题，以规范当地金融市场，保障侨胞合法权益。针对海外华侨为了结汇便捷通过地下钱庄完成资金快速流转，对非法买卖外汇的违法性、危害性、风险性认识不足的问题，联合当地侨联进行专项普法宣传，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 **【典型意义】**

对于出借外汇账户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提供帮助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在行刑反向衔接中要共同研究探讨，综合判断社会危害性、行政违法性、处罚必要性，找准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消除追责盲区。同时，关注案件背后所反映的本地在外汇结售汇业务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问题，深化检汇沟通协作，通过分析研讨、座谈交流、听取意见等形式，认真研究，加强政策宣传，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

#### **案例四 樊某、赵某某、罗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

#####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 非法买卖外汇 对敲 境外保险 检汇协作

##### **【基本案情】**

2018 年 7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何某炜等人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以外，以营利为目的，参照当日人民币兑换港币、美元汇率，通过增加汇率点差的方法，通过境外社交媒体建立换汇群，发布换汇信息，利用在推广保险业务期间所积累的境外开户、换汇渠道等资源便利条件，撮合介绍有换汇需求的内地保险客户、朋友把人民币和港币、美元之间进行双向兑换，用于交境外保费或者境内投资、消费等，非法从事买卖外汇、介绍买卖外汇，涉案金额 3.67 亿元人民币。何某炜非法获利 249 万元人民币。樊某、赵某某、罗某某在何某炜提议下以“对敲”方式变相买卖外汇实现货币价值转

换，非法换汇金额分别为 869 万元人民币、842 万元人民币、808 万元人民币，分别获利为 2.79 万元、2.27 万元、1.45 万元。

2023 年 12 月 28 日、2024 年 8 月 16 日，江苏省江阴市公安局分别对何某炜及樊某、赵某某、罗某某三人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4 年 6 月 27 日，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对何某炜依法提起公诉。因其具有退出违法所得、立功等情节，江阴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400 万元人民币。

江阴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樊某、赵某某、罗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行为，但三人犯罪情节轻微，已退出违法所得，且具有自首、从犯、立功等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对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 **【行刑反向衔接情况】**

**审查核实。**江阴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樊某等三人利用销售境外保险渠道以境内外“对敲”的方式，从事营利性的变相买卖外汇、非法介绍买卖外汇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樊某等三人还存在的未营利的非法介绍买卖外汇行为，也应依照外汇管理规定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会商协作。**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在上级检察院指导下与外汇管理部门围绕本案行政违法事实认定、行政处罚必要性、后续反向

衔接相关程序等进行会商协作：1. 明确移送证据标准。根据外汇管理部门提出的营利与非营利、变相买卖外汇与非法介绍买卖外汇行为的区分标准，江阴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证据材料梳理，形成“主客观证据+统计表格”的证据移送模式，对聊天记录、境内外交易明细表等关键证据予以标注说明。2. 现场协助调查取证。樊某等人涉及的变相买卖外汇、非法介绍买卖外汇高达 232 笔，资金往来混杂，外汇管理部门需要逐笔核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为此进行现场协助，对外汇管理部门提出的疑问进行当面解答。3. 密切配合高效衔接。为使行政调查高效开展，外汇管理部门与检察机关联合对樊某等三人法治教育，促使樊某等配合调查取证、如实供述违法事实。

**检察意见。**2024 年 10 月 22 日，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樊某、赵某某、罗某某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国家外汇管理局无锡市分局经调查认定樊某非法买卖外汇 830 万元、非法介绍买卖外汇 2145 万元，非法获利 2.79 万元；赵某某非法买卖外汇 1634 万元、非法介绍买卖外汇 1551 万元，非法获利 2.27 万元；罗某某非法买卖外汇 369 万元、非法介绍买卖外汇 1187 万元，非法获利 1.45 万元。2024 年 10 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外汇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鉴于樊某、赵某某、罗某某积极主动配合行政检查，在一般情节量罚区间下限到中间

值之间，对樊某非法买卖外汇和非法介绍买卖外汇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款 267.9 万元人民币；对赵某某非法买卖外汇和非法介绍买卖外汇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款 286.7 万元人民币；对罗某某非法买卖外汇和非法介绍买卖外汇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款 140 万元人民币。上述行政罚款均已收缴入库。

**机制建设。**以本案行刑反向衔接为契机，江阴市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无锡市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阴金融监管支局、江阴市公安局等部门进行多方座谈，探索建立外汇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出台《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惩治金融违法犯罪、防范金融风险协作机制的意见（试行）》，充分发挥各方在金融监管、惩治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作用，有效提升打击非法买卖外汇的工作合力。

### **【典型意义】**

境外金融机构对境内居民开展业务应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法保险销售代理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未经批准向境内居民推介销售境外保险产品，并规避外汇监管，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本外币兑换，严重扰乱境内金融管理秩序。

非法买卖外汇案件中，是否营利并非行政处罚的必要要件，主观营利目的需要通过对汇率差、固定费用、关联利益等客观证据的分析予以认定，是否实际盈利不影响对“以营利为目的”的

认定。对于通过非法买卖外汇直接获取收益或换取其他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具有营利目的。

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应当深化沟通协作，对非法买卖外汇案件证据标准达成共识，构建外汇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合力筑牢惩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屏障。

### **案例五 赵某萍、姚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

####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 非法买卖外汇 指定管辖 衔接机制

#### **【基本案情】**

从 2016 年开始至 2022 年 12 月，姚某辰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许可，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对外承接卢布与人民币兑换业务，从中赚取外汇差价或手续费，非法买卖外汇 2400 余万人民币，违法获利 48.5 万元。赵某萍和姚某在姚某辰的安排下，加入“哈巴捷”微信群，并通过群成员间相互拆借资金，非法买卖外汇，从中赚取外汇差价或手续费。赵某萍涉案 690 余万元人民币，违法获利 15 万元；姚某涉案 580 余万元人民币，违法获利 25 万元。

2023 年 7 月 7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公安局以姚某辰、赵某萍、姚某等 5 人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3 年 11 月 30 日，同江市人民检察院对姚某辰等 3 人依法提起公诉，姚某辰、因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主动上缴违法所得等情节，同江市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人民币。

同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赵某萍、姚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主动上缴全部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量刑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 **【行刑反向衔接情况】**

**审查核实。**同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应移送行政机关对赵某萍、姚某作出行政处罚。经与外汇管理部门核实，赵某萍、姚某尚未被行政处罚，因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江市支局无处罚权，同江市人民检察院将情况上报其上级检察院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

**会商协作。**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在上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获得指导的同时，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佳木斯市分局就该案反向衔接沟通协商，确定由同江市人民检察院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江市支局制发《检察意见书》，由同江市支局通过内部层报确定行政案件管辖。由于赵某萍、姚某的非法买卖外汇的资金交易地、账户开立地等行为发生地既有同江市，也有牡丹江市，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指定该案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牡丹江市分局办理。



经协商，牡丹江市分局补充证据材料等相关工作可以直接对接同江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意见。**2024 年 2 月 29 日，同江市人民检察院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江市支局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及时对赵某萍、姚某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关处罚。

**处理结果。**国家外汇管理局牡丹江市分局立即开展行政调查，查实赵某萍非法买卖外汇 19 笔，金额共计 179 万元人民币；姚某非法买卖外汇 51 笔，金额共计 457 万元人民币。2024 年 6 月 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牡丹江市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外汇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第九条规定，鉴于赵某萍、姚某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按照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对赵某萍作出警告，处罚款 1.79 万元人民币；对姚某作出警告，处罚款 4.58 万元人民币。罚款已收缴到位。

**机制建设。**结合办理本案，佳木斯市检察院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佳木斯市分局联合制定《关于加强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意见》，明确适用范围、管辖协商、听取意见、协作补证、向被不起诉人释法告知等，确保在遇到行政管辖异议、外汇管理部门因办案需要补充证据材料和传唤被不起诉人等难题时，检汇双方全力协作、配合。检汇两部门还共同梳理外汇领域的刑事、行

政法律规范，联合制发《外汇领域常见罪名法条指引》，为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提供明确办案指引。

###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对管辖发生争议的，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对于外汇管理部门指定管辖的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外汇管理部门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沟通协商，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移送同级外汇管理部门，受移送的同级外汇管理部门认为其无管辖权的，可以通过内部层报确定管辖。外汇管理部门行政调查工作可以与刑事案件管辖地检察机关直接对接，就补充证据材料等相关问题协作、配合，有效解决跨区域外汇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调查取证等问题，提高行政效率。

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通过联合建立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长效机制、外汇领域常见罪名法条指引，统一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在办案思路、案件管辖、证据认定、处罚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共同推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依法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维护金融安全。

## **案例六 某科技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行刑反向衔接案**

###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 非法买卖外汇 可处罚性

### **【基本案情】**

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某某为给单位谋取利益，与某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负责人合谋，由齐某某联系商家或个人将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农产品以上述公司的名义出口，并将报关单、提单等材料交付给上述公司，上述公司以报关单、提单等为依据，伪造购货合同、对应箱单，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等伪造农产品进项，由齐某某从姚某某处购买外汇打入上述公司账户伪造出口收汇，以自产货物向国家税务机关申请出口退税，共骗取出口退税金额人民币 2.45 亿元。姚某某使用其控制的某科技公司境外账户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通过齐某某介绍，按照每一万美元额外收取 400 元至 700 元好处费的价格，将公司通过国际网购平台出售电子产品的美元货款，卖给齐某某，并按齐某某指示，将外汇划转至某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金额共计 1697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13 亿元。

2021 年 12 月 29 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齐某某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2 年 4 月 12 日芝罘区人民检察院报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对齐某某依法提起公诉。2023 年 5 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齐某某伙同他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齐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23 年 3 月 13 日,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某科技公司、姚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芝罘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经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姚某某以某科技公司名义出售的美元不是其合法收入, 认定某科技公司、姚某某构成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2024 年 2 月 27 日, 芝罘区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 对某科技公司、姚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 **【行刑反向衔接情况】**

**审查核实。**芝罘区人民检察院重点围绕非法买卖外汇违法事实、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及处罚对象的准确认定开展审查工作: 一是某科技公司未通过指定场所私自将外汇出售, 违反了《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的规定, 行政违法事实清楚。二是某科技公司向某供应链有限公司等 9 家公司出售美元的行为, 属于在国家规定场所以外售汇的单位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规定, 除对金融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实行行政双罚外, 对其他境内机构仅处罚单位, 不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故本案的行政处罚对象应为某科技公司。三是查明某科技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导致巨额跨境资金无序流动, 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 本案具有行政处罚的必要性。

**会商协作。**因本案涉及结汇、售汇相关专业知识, 案情疑难复杂、案值较大, 芝罘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情况向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汇报, 两级检察机关多次与外汇管理部门、侦查机关召开联席会议,

就案件移送、证据移交、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充分交流，共同制定《关于加强外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在线索互转、调证协作、案件会商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为提升办案质效，检察机关利用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将侦查机关电子卷宗中用于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如专项审计报告、电子数据等，依法移送至外汇管理部门予以审查，节约外汇管理部门重新取证的时间，为外汇管理机关较短周期办结案件提供保障。

**检察意见。**2024 年 3 月 12 日，检察机关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分局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根据《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某科技公司予以处罚。

**处理结果。**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分局采纳检察机关的检察意见，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外汇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在一般情节量罚区间中间值到上限之间，对某科技公司作出警告，处罚款 1585 万元人民币，并将处理结果回复检察机关。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烟台市分局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典型意义】**

对于非法买卖外汇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要厘清外汇领域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双罚制的差异，重点围绕被不起诉人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核实，准确把握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在构成要件、责任主体和

证据标准等方面的不同，坚持行政处罚的法定性和必要性，依据事实和法律，准确认定处罚对象，确保“应罚当罚”，避免“不刑就行”。

针对涉外汇管理领域案件专业性较强的特点，检察机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应深化协作配合，通过召开联席会议、会签衔接意见等方式建立沟通和反馈机制，共同解决案件移送、证据移交、信息共享等问题，实现行刑有序衔接，合力维护外汇管理秩序。

##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 依法惩治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招标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招投标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招投标乱象、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作出明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组织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协同整治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严厉打击以非法手段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持续完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着力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招投标市场环境。

当前，串通投标犯罪案件呈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犯罪手段隐蔽化、犯罪链条组织化的新特点和新动向，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损害了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现公布 6 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了裁判尺度，为有效惩处犯罪、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指引。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坚持全领域覆盖，实现全链条打击。招投标活动涉及领域广泛、环节众多，串通投标行为在多个领域和环节渗透，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工程建设、物资采购、



土地承包等多个经济领域。在具体方式上，包括招标方在拟定招标方案时与投标方内外勾结，招标代理机构居中牵线，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围标陪标等多种类型。对于此类案件，一方面要秉持全领域覆盖理念，无论案件发生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均坚决依法惩处；另一方面注重全链条惩处，对串通投标黑灰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人员进行全面惩处，确保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二是严格适用法律，依法精准定性。随着实践发展，串通投标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隐蔽性强、衍生犯罪多样的新特点。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出现了多种新型犯罪手法：招标方为意向投标人量身定做招标参数，表面合法，实则暗箱操作；招标代理机构通过不正当手段控制评标专家评分账户，虚假评分；投标人为了规避大数据监控，采用阶梯式布点报价的方式进行围标。面对这些复杂的犯罪手法，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深入审查招标文件、电子数据、行为手段、资金流向等核心证据，建立实质违法性判断标准，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同时，对于案件中涉及的行贿、受贿、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等其他犯罪行为，依法数罪并罚，实现对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

三是落实宽严相济，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在依法惩治串通投标犯罪的过程中，突出从严惩处的总基调，通过判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等手段“打财断血”，彻底铲除犯罪分子的利益链条。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 4 中，依法对袁某判处罚金，并判令追缴其通过卖标所得的违法收入 400 万元。同时，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综合考虑个

案的犯罪情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情况，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资源，确保量刑的精准性和合理性。在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标案中，对其二人宣告适用缓刑，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裁判导向，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是用好司法建议，深化协同治理。**积极践行“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在审理串通投标案件的同时，通过梳理招投标活动存在的隐患，向行业主管部门制发司法建议，提示资质审查、评标规则设计、电子招标系统安全防控等环节存在的高发风险。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发现某主管部门在招投标监管中的薄弱环节，随即发出司法建议书，不仅指出问题，还提出具体改进措施，以个案纠错推动系统治理，形成了预防和打击串通投标犯罪的工作合力，实现了“办理一案、预警一域、规范一行”的良好效果。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行政监督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依法从严惩处招投标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深化招投标改革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招投标市场环境，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目录

案例 1：被告人张某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串通投标行为

案例 2：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

案例 3：被告人李某琼受贿、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医疗领域“量身定做”串通投标行为

案例 4：被告人袁某、赵某串通投标、行受贿案——依法惩治教育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

案例 5：被告人王某串通投标、伪造印章案——伪造印章后用于串通投标，应依法数罪并罚

案例 6：被告人潘某受贿、串通投标案——制发司法建议，推动招投标领域综合治理

## 01 被告人张某串通投标案——

### 依法惩治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串通投标行为

#### 基本案情

2022 年 6 月，青岛某公司通过招标系统发布招标需求，被告人张某作为该公司员工，负责主导资源方招标。为使投标人武某（另案处理）竞得该项目，张某指使其他评委给武某联系的围标公司打高分，并亲自“协调”有不同意见的评委，评委迫于压力，将评分账户账号及密码交与张某的下属员工。随后，该员工进入评委的评分账户，给围标公司打出最高分，使武某联系的围标公司最终中标。中标后，青岛某公司与该围标公司签订营销框架合同，合同约定项目报价金额 400 余万元。后围标公司将该项目转至武某实际控制的

公司实施。

### 裁判结果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作为青岛某公司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评委打分的方式排除公平竞争，其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遂以串通投标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张某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民营企业自主开展的公开招标中“操控评委打分”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民营企业招投标过程中，部分投标人盲目追求利益，通过关联公司围标、与招标单位人员串通等违法犯罪手段来谋求中标，损害民营企业利益。本案中，张某作为招标公司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明知投标人使用关联公司围标，仍通过引导、干扰、代替评委打分的方式为围标公司谋取高分，使围标公司成功中标。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正常的招投标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的合法利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充分考虑了其涉及招标人与投标人内外勾结，多次“协调”多名评委给围标公司打高分等情节，损害招标单位民营企业利益，认为不宜适用缓刑，体现了坚定保障民营企业利益，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和态度。

## 02 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标案

## ——依法惩治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

### 基本案情

2018 年 6 月底，福建省建瓯市某镇某村将本村茶山经营管理权对外公开招标。当地茶农、被告人王某甲和王某乙兄弟二人均有意参与竞标。在王某甲的提议下，兄弟二人商定串通投标报价，计划中标后共同经营该项目。投标当天，王某甲和王某乙以自己及亲友等 13 人的名义报名参与，并在现场威胁其他投标人，恐吓招标方工作人员。此外，王某甲还在场外向其他投标人承诺给予每人 1000 元的陪标费，以阻止他人继续参与投标，并在中标后实际给予参与投标人共计 1.6 万元。最终，王某甲以 35.5 万元的投标报价顺利中标。该项目由王某甲和王某乙共同经营。

### 裁判结果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甲与被告人王某乙在投标过程中相互串通，采用威胁、贿赂等非法手段，损害村集体和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均构成串通投标罪。其中，王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乙作用较小，系从犯。二被告人均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情节，依法从轻处罚。综上，以串通投标罪分别判处王某甲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判处王某乙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已生效。

###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茶

产业是福建的支柱产业之一，公开招投标是农户取得茶山经营权的主要形式。近年来，日益增多的茶山经营权领域串通投标行为，损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茶农的经济利益。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甲和王某乙系从事茶叶生产经营活动的当地茶农。在公开招投标活动中，为获取茶山经营权，二人串通投标报价，犯罪金额虽未达到立案标准，但通过威胁、贿赂等非法手段阻止他人投标，亦属情节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准确认定二被告人构成串通投标罪，有力维护了茶产业公平竞争秩序，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同时，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系农民在承包土地期间的个人犯罪，且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赔偿损失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遂依法区分主从犯，分别裁量刑罚并宣告缓刑，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重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彰显了司法温度。

### 03 被告人李某琼受贿、串通投标案

#### ——依法惩治医疗领域“量身定做”串通投标行为

#####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琼系湖南省新宁县某医院院长。2016 年 8 月，周某斌（另案处理）向李某琼推销核磁共振设备，并承诺给予好处。李某琼遂让周某斌找三家公司参加围标，并根据周某斌提供的核磁共振设备各项参数，安排招投标代理公司制定招投标文件。2017 年 2 月，周某斌利用其实际控制的上海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其他两家企业参与围标，最终上海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标，合同标的额为 823 万元。事后，周某斌为感谢李某琼在采购核磁共振设备上提供



的帮助，送给李某琼 35 万元。另查明，李某琼另受贿 856 万余元，诈骗 844 万余元。

## 裁判结果

湖南省新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琼在政府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与投标人共谋，通过设定特殊设备参数的方式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李某琼利用担任新宁县某医院院长的职务之便，在药品及医疗耗材采购、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承揽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891 万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李某琼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 844 万余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李某琼具有立功、坦白、退缴部分受贿犯罪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李某琼以受贿罪、诈骗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对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零五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判决已生效。

##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医疗领域腐败与串通投标交织的典型案例。近年来，腐败与政府采购招投标乱象相互交织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以设定特定条件的形式排斥其他投标者，严重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本案中，监察机关在调查被告人李某琼涉嫌犯受贿罪期间，发现其涉嫌串通投标、诈骗的犯罪线索，遂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侦查，

李某琼作为招标方，与投标人周某斌共谋，通过量身定制招标参数的形式组织多家公司围标，构成串通投标罪。事后，李某琼收受周某斌所送 35 万元，构成受贿罪。李某琼的串通投标行为与受贿行为系两个独立实施的犯罪行为，侵害了不同的法益，人民法院对李某琼犯受贿罪与串通投标罪决定数罪并罚，准确全面评价犯罪事实，依法严惩医疗领域内外勾结串通投标行为，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市场良性运行，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 04 被告人袁某、赵某串通投标、行受贿案

##### ——依法惩治教育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

#### 基本案情

2021 年间，为中标云南省富宁县某公立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原料统一配送项目，被告人袁某向与富宁县某领导关系密切的郑某（另案处理）行贿 60 万元，请托其帮助被告人赵某实际控制的云南某立公司成为本次招标代理机构，以达到操纵该项目招投标的目的。云南某立公司成为该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后，袁某向赵某行贿 60 万元并伙同其通过“拆分售卖标段”的方式，在投标过程中由招标代理机构事先审核投标书，协商多家投标公司的标书内容，内定云南某昇公司中标该项目的食品配送单位，中标金额共计 6565.55 万元。招投标期间，袁某共收取卖标费 400 万元，行贿 120 万元。调查期间，袁某主动退赃 11 万元，赵某主动退赃 55 万元。

#### 裁判结果

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赵某相互串

通，通过贿赂、买卖等非法手段谋求意向中标人中标，严重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损害了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串通投标罪。袁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并向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行贿，数额较大，分别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赵某利用其作为招标代理机构实际控制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帮助投标公司顺利中标，数额较大，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综上，对被告人袁某以串通投标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对被告人赵某以串通投标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对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七十五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判决已生效。

###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教育是国之根本，依法从严惩处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原料统一配送环节的串通投标犯罪，不仅是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的必要措施，更关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本案中，被告人袁某、赵某等人以行受贿、围标、卖标等多个手段串通招投标，内定招投标代理机构及中标食品配送单位，严重干扰校园食品原料配送管理和学生饮食健康需求，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对此，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数罪并罚，进一步加大适用财产刑力度，通过判处罚金、追缴违法

所得等措施，全力“打财断血”，彰显了坚决斩断教育领域围标、串通投标利益链条的鲜明态度，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教育民生安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坚定决心。

## 05 被告人王某串通投标、伪造印章案

### ——伪造印章后用于串通投标，应依法数罪并罚

#### 基本案情

2016 年，被告人王某提供印章印模，到天津市某复印照相刻章店伪造了以下印章：天津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力管理专用章 1 枚、天津市某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支队印章 2 枚、天津市某区卫生院印章 1 枚、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某中心基金征集专用章 2 枚、天津市某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 1 枚。2017 年 8 月，王某明知张某（另案处理）采用借用和冒用其他公司资质及工作人员名义、串通投标报价等方式围串标，仍在天津市宁河区多个公开招标工程项目中帮助张某借用天津某达公司、某坤公司等资质，并使用伪造的天津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力管理专用章、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某中心基金征集专用章制作了 9 张虚假的社保缴费单交给张某。张某最终中标，中标项目金额 846 万余元。另查明，2018 年 8 月，王某伪造了赵某艮等 3 张居民身份证。

#### 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串通投标罪；王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居民身份证，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王某在串通投标罪中系从犯，可从轻处罚。遂对被告人王某以串通投标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对被告人王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二千八百五十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已生效。

###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涉及串通投标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人民法院日益精准把握串通投标罪及其关联犯罪的构成要件，坚持依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准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和罪名。当行为人实施了多种犯罪行为时，严格依据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审慎判断是否应当数罪并罚。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犯罪行为往往与行贿、伪造证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犯罪链条，给司法认定带来较大挑战。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先期实施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犯罪行为，随后在张某的授意下，利用伪造的印章制作虚假社保缴费单，用于冒充其他公司职员串通投标，其行为侵犯了多种法益。人民法院针对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行为，坚持分别单独进行法律评价，并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彰显了法律权威。

## 06 被告人潘某受贿、串通投标案

### ——制发司法建议，推动招投标领域综合治理

#### 基本案情

2022 年 12 月，杭州某平台发布了富阳某公共建设工程项目招标公告。被告人潘某系该项目业主单位代表。投标人俞某、袁某（均另案处理）提前获知该招标项目后，借用十余家建筑企业资质参与投标，并统一安排商务报价下浮率，以阶梯式布点报价方式规避大数据监测，促使袁某控制的某建设集团入围第二轮专家评审。袁某通过行贿手段拉拢潘某，指使其在评标时给予目标企业高分，并通过其他中间人贿赂相关评标专家、项目代理公司员工，使某建设集团获得明显高分，最终中标工程项目。在该项目中，潘某伙同他人共同收受袁某贿赂款现金 125 万元。另查明，2017 年至 2023 年间，潘某利用担任杭州某集团有限公司前期部主任、总工程师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292 万元。

####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伙同他人串通投标报价，损害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潘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潘某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等从轻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上，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以串通投标罪判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对潘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五十二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已生效。

###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公共建设项目中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重大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权力集中、资源密集、程序专业，涉及资金巨大，串通投标行为与腐败犯罪交织，严重扰乱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平公正，受到社会高度关注。本案中，被告人潘某作为涉案项目业主单位代表、评标专家，为袁某控制的投标公司打出明显高分，并收受他人贿赂。人民法院针对串通投标犯罪与腐败行为等相互交织的特点，通过多层次、多维度依法惩处关联犯罪，加大了整体打击力度，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贯彻以案促治司法理念，做实做优“抓前端、治未病”工作。针对工程领域利益风险突出的特点，人民法院时刻聚焦由此产生的腐败及串通投标共性和个性问题，及时向相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会同研判招投标运行过程中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点，研究具体招投标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盲区和漏洞，制定切实有效的招投标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举措，并狠抓跟踪落实，接收单位积极响应并回函通报情况，协同推动招投标领域综合治理。

## 上海律协反舞弊与刑事风控专业委员会

---

电话：021-64030000

网址：[www.lawyers.org.cn](http://www.lawyers.org.cn)

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789 号均要国际广场 20、33、35 楼